

数字经济与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研究综述

钟媛媛

南京邮电大学经济学院, 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1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3月2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2日

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数字经济与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梳理和分析各学者的研究成果, 系统总结数字经济在外贸高质量发展中的驱动效应、影响路径及区域差异性。本文认为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不仅提升了外贸的效率和竞争力, 还促进了外贸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然而, 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如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问题。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提出了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与外贸深度融合的策略和建议, 旨在为中国外贸的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推动中国外贸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关键词

数字经济, 外贸, 高质量发展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Yuanyuan Zhong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March 11, 2026; accepted: March 23, 2026; published: May 22,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By reviewing and analyzing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various scholars, it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driving effects, influence pathways, and regional dispariti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the context of high-quality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osits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force i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It has not only enhanced the efficiency and competitiveness of foreign trade but also facilitated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ts structure.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lso brings new challenges, such as data security and privacy protection. Building on a summary of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proposes strategies and recommendations to further deepe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foreign trade,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sustaine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and to promote its achievement of higher quality and more sustainable growth.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Foreign Trad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数字技术的不断崛起，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全过程，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土壤，不断拓展着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潜力，迸发出强大动能。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进行引导。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总体要求、主体发展、强化组织保障的措施等¹。在这一系列政策的强有力支撑下，我国数字经济呈快速增长态势。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4年)》显示，2023年，美国、中国、德国、日本和韩国这五个国家的数字经济总和已突破33万亿美元，年增长率超过8%；其中数字经济占GDP比重60%，比2019年提高了大约8个百分点。从内部结构来看，产业数字化的驱动作用不断增强，2023年占数字经济比重达86.8%，比2019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1]。数字经济以其强大的渗透力和创新能力，为各行各业带来了空前的变革机遇，也成为国际贸易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过去，我国依靠低廉的劳动力等优势，在传统外贸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绩。然而，当前这一传统优势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过去十年我国劳动力成本涨幅超过一半、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等形成的压力逐渐触及临界点。如何寻找新的突破，成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研究方向和切入点。

1.2. 研究意义

本文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还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首先，从理论层面来看，通过对数字经济与外贸高质量发展关系的探讨，扩展了现有的贸易理论体系，使其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需求。从实践层面来看，本文的研究成果为推动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当前，我国正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和经济改革的双重压力，数字经济脱颖而出，成为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数字经济不仅直接促进了外贸高质量发展，还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化路径间接影响外贸质量的提升[2]。这些研究结果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¹https://www.gov.cn/zhengce/202411/content_6989832.htm.

2. 文献来源与基本特征

2.1. 文献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以“数字经济 + 外贸高质量发展”为检索词进行组配检索,检索字段限定为篇名、摘要和关键词,文献类型选择“学术期刊/学位论文”。截止 2024 年 12 月 10 日,共检出文献 258 篇,运用迭代查找法补充主题相关文献 2 篇,剔除重复、研究主题不符、信息不全以及无法获取全文等因素的文献 72 篇,最终获得核心样本文献 188 篇,其中北大核心、CSSCI 共 36 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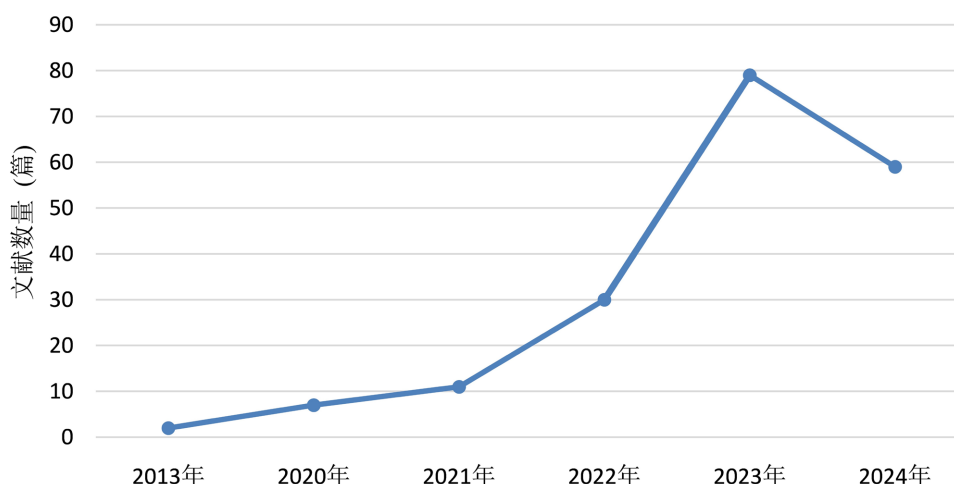


Figure 1. Distribution map of publication years
图 1. 发文年分布图

2.2. 基本特征

样本文献每年的累计数量变化情况如图 1 所示。可以看出 2020 年之前对数字经济与外贸发展主题的关注度较低,从 2021 年开始相关研究呈现稳步增长趋势,这也与近年数字技术发展和应用现状相一致。此外,188 篇样本文献中最高被引次数为 276 次,平均被引用 12.52 次,共有 19 篇文献被引次数大于 10 次。最高被下载次数为 10,014 次,最低下载次数为 3 次,平均下载次数 1136.14 次。由图可以看出,公共卫生事件前外贸快速发展,与数字经济结合的研究越来越多,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关于外贸和数字经济的研究也减少了。

3. 概念界定

3.1. 数字经济

当前关于数字经济的权威定义尚未形成统一标准,综合各位专家学者的观点,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数字经济定义。何泉吟(2013)提出,“数字经济”是一种新兴的、以知识为依托、以数字技术为催化剂,可以对经济活动产生积极影响的一种全新的、数字化的经济模式[3]。逢健和朱欣民(2013)提出,以信息通讯技术为依托,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交互方式,数字经济可以使人们的交往和交易活动数字化,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进而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4]。G20 杭州峰会(2016)上明确数字经济是指以数字化信息和知识为核心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高效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为主要驱动力,以优

化经济结构为主要目标的一种社会经济行为[5]。Tapscott Don (1996)首次提出了数字经济的概念,他认为电子商务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会带动一种全新经济类型产生,且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6]。Brent R. Moulton (1999)延伸了数字经济的概念,认为数字经济应该包括“电子商务”、“信息技术”以及与它们相关的一系列经济活动[7]。R. Kling 和 R. Lamb (1999)提出,数字经济与信息经济还是存在很大区别的,它应该对数字技术的产品和服务、数字基础设施以及 IT 产业自身具有高度依赖性[8]。R. Heeks (2008)认为数字经济应该是一整个经济运行流程,包括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软件、ICT 货物与服务的预定、生产、销售以及售后工作[9]。

综合以上观点,本文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以互联网和信息化基础设施为重要载体,以大量信息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正在与实体经济不断融合的新型经济形态。

3.2. 外贸高质量发展

贸易质量最早出现于冯德连(1995) [10]的研究,在此之后贸易质量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目前诸多学者从新发展理念出发,不断探讨并界定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例如,戴翔和宋婕(2018)认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就是要实现横向维度上更加平衡和纵向维度上更加充分的发展,其内涵和特征应该至少包括产业与科技基础雄厚,外贸实现平衡、融合与优化发展,国际竞争力强,综合服务制度体系完备以及拥有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话语权等方面[11]。曲维玺等(2019)认为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包含了创新、平衡、协调、融合、绿色多方面因素[12]。裴长洪和刘斌(2019)探讨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外贸发展潜在的机遇和挑战,并指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方向,一是稳定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速度;二是努力发展服务贸易;三是抓住历史机遇,抢占数字贸易发展先机;四是继续开拓新市场,形成新的国际供应链关系[13]。

3.3. 数字经济与外贸高质量发展

针对数字经济发展对外贸品质提升作用的研究我国起源于 90 年代初。贾松涛和杨晓娟(2022)通过研究指出,数字经济通过降低研发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增强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14]。夏陈平(2023)的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拓宽市场渠道,显著扩大了企业的市场范围[15]。张雨格(2023)从国内角度出发,探究了数字经济如何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增强我国外贸竞争力,并指出这种影响在不同地区表现出差异性[16]。李宏兵等(2023)则从国际贸易双方的角度出发,发现两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均有利于提升贸易增加值[17]。付文字等(2024)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对外贸高质量发展具有区域异质性特征、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先逐渐增强而后又有所减弱等特点[18]。王小梅和张岩(2024)的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服务出口效率,其机制包括加速服务业创新、降低服务贸易成本以及拓展国际市场[19]。R. L. Ibrahim 将信息化投资、联网数量等因素作为衡量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能力和普及率的指标,并分析了它们对国际贸易的影响[20]。

4. 分析评述

针对数字经济与外贸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主要从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三个维度展开理论分析,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分析路径进行深度评述,并结合实证方法,讨论不同模型的优缺点及其适用场景,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方法论参考。

4.1. 直接效应的理论逻辑与实证验证

从直接效应来看,数字经济通过信息传递的高效性,推动农业、工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进而提

升外贸的整体运行效率与产品附加值。具体而言,生产商借助数字化手段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与成本的降低,推动产品多样化;中间商作为交易桥梁,数字化为其提供了更多企业解决方案,提升了企业内部及企业间的协作效率。服务提供商确保了对外贸易的顺畅执行,服务中,数字经济简化了操作流程,优化了工作环境。承包商能够为贸易提供专业技术和资源,而数字经济能够帮助承包商整合这些资源,消除信息障碍,均衡信息不对称,从而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为高品质的对外贸易增添动力[21]。

上述理论路径在实证研究中主要依托基准回归模型进行验证。该类模型以各省份外贸高质量发展指数(Thq)为被解释变量,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引入一系列控制变量,控制个体与时间效应,从而评估数字经济对外贸质量的直接影响。该模型的优势在于结构清晰、易于解释,能够直观反映核心变量之间的统计关系,适用于验证数字经济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效应。然而,其局限性也较为明显:首先,基准回归模型难以揭示变量间的作用机制与传导路径;其次,该模型对数据质量要求较高,若存在遗漏变量或测量误差,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偏误;最后,模型对面板数据的时间跨度和区域异质性较为敏感,需结合稳健性检验以增强结论的可信度。因此,基准回归模型适用于初步验证核心假设,但在机制探索方面存在不足,需结合其他模型进行补充。

4.2. 间接效应的中介机制与模型适用性

间接效应方面,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数字经济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加快科技创新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三条路径,间接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

4.2.1. 数字经济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对外贸易的品质提升与数字经济紧密相连,其推动力源自人力素质的增强。在数字化浪潮中,先进的技术是数字经济的驱动力,它能够为商务活动减少成本、提升效率,对企业结构产生关键影响。而这些技术的进步,离不开人力素质的提升[22]。从技术革新的视角来看,互联网、5G通信、大数据等技术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普及,渗透到对外贸易的每一个环节,这一切都凝结了无数人才的智慧和努力。此外,数字经济还通过提高员工技能来推动人力素质的提升,例如网络平台上共享的培训资源,使得从业人员能够更容易地提升劳动技能,从而为整个对外贸易流程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提升了对外贸易的效率和质量。

4.2.2. 数字经济通过加快科技创新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从推动科技创新的角度审视,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增长。对外贸易领域,由于其固有的国际性、跨文化交流特性以及与国家经济的紧密联系,自然成为科研创新的排头兵,显示出对创新的迫切需求。在数字化时代,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密不可分,数据、资源、资本、知识技术等科技创新的关键要素因数字经济的推动而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23]。在数字经济与知识共享经济的共同作用下,对外贸易领域的诸多要素实现了跨领域的共享,这既有助于冲破原有的信息障碍,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也推动了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其次,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外贸企业纷纷寻求产业升级或数字化转型,核心目标在于效率提升。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探索新的路径,追求新技术、新整合能力等科技创新成果。数字经济带来的高效数据流通及数据处理方式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基础支持,而科技创新又为对外贸易注入了强大动力,通过新的生产模式、技术和设备等推动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24]。

4.2.3. 数字经济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的崛起为对外贸易的品质跃升提供了新动力,其作用机理在知识产权的维护上尤为显著。知识产权的维护,作为一种对创新成果如专利、商标、著作权的保障体系,是激励创新的关键手段,广泛被企业及个体所采用。依托数字经济时代的大数据、5G技术,我们能够更加精准地处理与链接信息,

追溯数据出处，定位信息源头发源地及网站的处理代码，这为创新者提供了确凿的证据支持，助力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健全[25]。如此，数字经济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倒逼企业创新，驱动外贸升级。

4.2.4. 模型验证

为验证上述中介机制，学界广泛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该模型通过构建三步回归框架，依次检验数字经济对中介变量(如自主创新水平、生产效率、生产成本)的影响，以及中介变量对外贸质量的影响，从而判断是否存在完全或部分中介效应。该模型的优点在于能够揭示变量间的作用路径，具有较强的机制解释力，能够为政策制定提供更为精准的切入点。但其局限性同样值得关注：首先，中介变量的选择与测量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若变量选取不当或测量误差较大，可能影响结论的可靠性；其次，该模型依赖于变量间严格的外生性假设，若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或遗漏变量，可能导致估计偏误；最后，中介效应模型难以处理多个中介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于复杂的传导机制可能存在简化处理的倾向。因此，在应用该模型时，需结合理论依据谨慎选择中介变量，并进行敏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以增强结论的科学性。

4.3. 空间溢出效应的理论拓展与研究现状

空间溢出效应视角下，数字经济被视为打破时空限制的重要力量，其影响不仅局限于单一区域，而是通过技术扩散、产业联动和市场整合等机制，在更广阔的地理空间内发挥作用。早期数字化区域通过技术外溢与示范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外贸发展；同时，数字经济的“虹吸效应”促使要素向发达地区集中，但也推动低附加值产业向外转移，形成区域联动与产业协同。这一视角拓展了传统贸易理论的空间维度，强调了区域间互动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为理解数字经济的空间传导机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然而，当前针对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仍较为薄弱，缺乏系统性的空间计量模型应用。未来可引入空间杜宾模型或空间滞后模型，以更精确地刻画数字经济的空间传导机制及其对外贸质量的跨区域影响。这类模型能够有效处理空间依赖性与空间异质性，适用于区域面板数据分析，能够揭示变量之间的空间交互效应。但空间计量模型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不同的权重矩阵可能导致结论差异；其次，模型对数据质量要求较高，若存在空间自相关或异方差问题，可能影响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最后，空间计量模型的解释相对复杂，需要结合理论背景进行谨慎解读。因此，在应用空间计量模型时，需结合地理距离、经济联系等多重维度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并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以确保结论的科学性与可靠性。

4.4. 综合评述与方法论启示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具有多层次、多机制的特征。直接效应体现了数字技术对贸易流程的全面渗透，间接效应揭示了制度与能力建设的中介作用，空间溢出效应则反映了区域协同与扩散机制。在实证方法上，基准回归模型适用于整体效应评估，中介效应模型适合机制验证，而空间计量模型则为区域互动研究提供了工具支撑。各方法各有优劣，研究者在选择时应结合研究问题、数据特征与理论假设，综合运用多种模型，以提升研究的深度与可信度。例如：郑小飞(2023)[26]通过模型，输入相关数据后得出了数字经济对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起到正向拉动作用且效果显著，且数字经济每增加一单位，外贸高质量发展水平增加0.181。

5. 研究中的不足和建议

5.1. 研究中的不足

尽管现有研究在数字经济与外贸高质量发展领域取得了丰富成果，但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更具象、更具启发性的方向深入拓展：

第一，研究视角宏观有余、微观不足，缺乏对异质性主体的精准刻画。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国家或省级层面，难以揭示数字经济对微观企业，尤其是中小外贸企业、民营企业和不同贸易方式企业(如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差异化影响。例如，付文字等[18]指出，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国家或地区层面，而忽视了微观企业层面的具体影响。梅澳裕等[27]也提到，尽管有学者尝试通过企业人均资本存量来反映企业间数字化投入的差异，但这种方法仍需进一步验证。未来研究可尝试回答：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动态演进？不同吸收能力、融资约束或管理效率的企业，在享受数字红利时是否存在“数字鸿沟”？

第二，数据维度单一、时效滞后，难以捕捉数字经济的快速演进特征。多数实证研究依赖年度宏观数据，更新周期长，难以反映数字技术快速迭代对贸易结构的即时冲击。如徐毅等[28]利用 2011 至 2020 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而这些数据的更新滞后可能导致研究结果无法反映最新的经济动态。同样，宁浩妃等[29]在分析数字贸易研究时也指出，国内研究在数据更新和前沿技术融合方面存在不足。未来研究可探索利用高维企业级大数据(如海关数据库与数字化投入指标匹配)、实时网络爬虫数据或夜间灯光数据，构建高频、多维度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动态追踪其对贸易韧性、复杂度和绿色转型的影响。

第三，机制检验较为传统，缺乏对非线性、复杂传导路径的深入挖掘。当前研究多采用线性中介效应模型，难以揭示数字经济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门槛效应、非线性溢出或因果链条中的交互调节机制。未来研究可引入机器学习方法(如随机森林、因果森林)或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技术是否通过“技术创新 + 人力资本 + 知识产权保护”的协同路径共同驱动外贸升级，并识别不同路径的边际效应差异。

第四，空间效应分析尚显薄弱，缺乏对区域协同与虹吸效应的深入解构。虽有研究提及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但多停留在描述性分析，缺乏对空间传导机制的系统建模。未来研究可构建多维空间权重矩阵(如基于数字基础设施联通度、技术相似度或产业链关联度)，结合空间杜宾模型或空间面板分位数回归，深入探讨数字经济对城市群内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效应与极化效应。

5.2. 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研究不足，本文提出以下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旨在推动数字经济与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深度融合：

第一，构建多层次、差异化的政策支持体系，回应微观主体异质性。鉴于企业层面数字化红利存在显著差异，政府应避免“一刀切”政策。建议设立“企业数字化转型梯度扶持计划”，针对中小外贸企业提供数字化诊断、技术引入补贴和跨境数据合规培训；同时鼓励龙头企业在供应链中发挥“链主”作用，通过数字化平台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转型，缩小“数字鸿沟”。

第二，推动数据基础设施与数据治理体系协同建设，解决数据滞后与孤岛问题。建议建立“外贸数字化动态监测平台”，整合海关、税务、物流及第三方平台数据，形成高频更新的“外贸数字画像”。同时，借鉴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经验，并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制定出适宜的数据保密和跨境传输规范[30]，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推动贸易数据的开放共享，为学术研究与政策评估提供高质量数据支撑。

第三，强化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的耦合机制，打通中介传导路径。鉴于数字经济的间接效应依赖于技术创新与制度环境，建议设立“数字贸易创新实验室”，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共建联合研发平台。同时，利用区块链等技术构建“知识产权溯源保护系统”，为原创技术提供可追溯、不可篡改的确权证据，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外贸从“价格竞争”向“技术竞争”转型。

第四，构建区域协同发展的数字生态，破解空间溢出机制不畅。针对数字经济空间效应尚未充分发挥的问题，建议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率先探索“数字贸易协同示范区”，推动区域

内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数据标准互认、贸易规则互嵌。同时，设立“数字产业梯度转移引导基金”，鼓励发达地区数字技术向中西部外溢，形成“技术扩散 + 产业承接”的双向联动机制，实现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协同共进。

参考文献

- [1] 张宏霞, 孙强. 数字经济促进港口高质量发展[J]. 云端, 2024(50): 114-116.
- [2] 张帆, 刘嘉伟, 施震凯. 数字经济与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基于二元边际的视角[J]. 统计与决策, 2024, 40(4): 114-118.
- [3] 何泉吟. 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及我国的战略抉择[J]. 现代经济探讨, 2013(3): 39-43.
- [4] 逢健, 朱欣民. 国外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与数字经济国家发展战略[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3, 30(8): 124-128.
- [5] 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EB/OL]. 2016-09-29. http://www.cac.gov.cn/2016-09/29/c_1119648520.htm, 2021-10-14.
- [6] Done, T. (1996) *The Digital Economy: 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 Mc Graw-Hill.
- [7] Moulton, B.R. (2000) GDP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Keeping up with the Changes. In: Brynjolfsson, E. and Kahin, B., Eds., *Understanding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MIT Press, 34-48. <https://doi.org/10.7551/mitpress/6986.003.0004>
- [8] Kling, R. and Lamb, R. (1999) IT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in Digital Economies: A Socio Technical Approach. *ACM SIGCAS Computers and Society*, 29, 17-25. <https://doi.org/10.1145/572183.572189>
- [9] Heeks, R. (2008) Researching ICT-Based Enterpris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alytical Tools and Models.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https://doi.org/10.2139/ssrn.3477388>
- [10] 冯德连. 推进外贸发展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思考[J]. 经济体制改革, 1995(5): 28-31, 127-128.
- [11] 戴翔, 宋婕. 我国外贸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路径及方略[J]. 宏观质量研究, 2018, 6(3): 22-31.
- [12] 曲维玺, 崔艳新, 马林静, 赵新泉. 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与对策[J]. 国际贸易, 2019(12): 4-11.
- [13] 裴长洪, 刘斌. 中国对外贸易的动能转换与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形成[J]. 经济研究, 2019, 54(8): 4-18.
- [14] 贾松涛, 杨晓娟. 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现状与挑战研究[J]. 科技经济市场, 2022(5): 37-39.
- [15] 夏陈平. 数字经济如何降低国际贸易壁垒[J]. 中国外资, 2023(24): 54-56.
- [16] 张雨格. 数字经济时代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开辟破局之路的策略研究[J]. 中国商论, 2023(24): 75-78.
- [17] 李宏兵, 张少华. 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赋能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 机制、挑战与路径[J]. 国际贸易, 2023(12): 50-60.
- [18] 付文字, 赵景峰, 贺子欣. 数字经济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影响机制[J]. 统计与决策, 2024, 40(3): 22-27.
- [19] 王小梅, 张岩. 数字经济发展对服务出口效率的影响[J]. 统计与决策, 2024, 40(15): 155-160.
- [20] Ibrahim, R.L., Alomair, A. and Al Naim, A.S. (2024) How Financial Development Heterogeneity, Macroeconomic Volatility, Domestic Investment, and Digital Economy Are Driving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in Africa. *Sustainability*, 16, Article 9281. <https://doi.org/10.3390/su16219281>
- [21] 曹俊文, 雷清雅. 新发展理念下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评价[J]. 统计与决策, 2021, 37(15): 100-104.
- [22] 胡缪甜. 数字经济背景下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对策研究[J]. 商场现代化, 2024(23): 23-25.
- [23] 汪小龙, 丁佐琴. 贸易便利化对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产业高级化视角的分析[J]. 中国流通经济, 2024, 38(11): 51-66.
- [24] 李雨豪, 康书生, 郝照辉. 绿色金融、数字化与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J]. 经济研究参考, 2024(10): 50-70.
- [25] 李倩. 数字经济背景下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现状与对策分析[J]. 中国会展, 2024(19): 88-90.
- [26] 郑小飞. 数字经济对外贸高质量发展驱动效应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杭州: 浙江科技大学, 2023.
- [27] 梅澳裕, 郑月明. 数字经济助推外贸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J]. 价格月刊, 2023(9): 60-70.
- [28] 徐毅, 王志强, 邓小华. 数字经济与外贸高质量发展——基于全国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J]. 价格月刊, 2023(5): 31-39.
- [29] 宁浩妃, 任重, 高昊琛. 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数字贸易国内外研究综述[J].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2(5): 81-92.
- [30] 李政. 健全推动西北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J]. 新疆财经, 2024(5): 18-22.